

**Speaking Modernity: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A Study of Media Discourse Based on the “Proposal of Abolis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n Wang

Jing Xu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battl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once again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in public opinion. This is not a new debate triggered by the pandemic, but a gam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modernity and non-modernity already triggered by the colli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modern times. This study takes the “Proposal of Abolis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1929 as a case study. It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amine how the pre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ipated in and construct the “debate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rough media discourse, so as to speak modernit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four forms of discourse debate in public opinion: abolishing TCM completely, refusing to abolish TCM, following the Western medicine system to reform TCM, and “Sinicizing” to reform TCM. These media discourse has become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taphysical debate” and reflects the “Sinicized” modernity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establishes “the other” to imagine modernity and denies metaphysics and its cultural forms to speak modern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relying on the medi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bat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iscourse is actually a debate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which contains the way to imagine and speak modernity.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forging Chinese theory and Chinese discourse, rethink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ity” in China with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outlin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Modernity; the debat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media discourse; the Proposal of Abolishing TCM

# 言说现代性：从“中西医之争”到“科玄之辩”

## ——基于民国“废止中医案”的媒介话语考

王楠，徐婧<sup>1</sup>

**【摘要】**新冠疫情爆发后，“中西医之争”再次成为舆论场的焦点之一。这并非疫情引发的新争论，而是近代以来东西文明碰撞已然引发的关于科学与玄学、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博弈。研究以“废止中医案”（1929年）为案例，应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其中的民国报刊如何通过媒介话语参与并建构“中西医之争”及其引发的“科玄之辩”，从而言说现代性。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社会舆论中存在彻底废止中医、拒绝废止中医、遵循西医体系改革中医、“中国化”路径改革中医四种话语论争的实践形态。这些媒介话语成为承载“科玄之辩”的典型表征，并体现出民国社会树立“他者”以想象现代性、否认玄学及其文化形式以言说现代性的“中国化”现代性建构方式。归根结底，依托于民国报刊之上的中西医话语之争，实则是科玄思想之辩，而想象并言说现代性的进路则蕴含其中。在当下锻造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时代语境下，以具体历史事件重思“现代性”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旅行”，是勾勒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现代性；中西医之争；科玄之辩；媒介话语；废止中医案

长期以来，在我国中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既独特又颇具争议，关于中医的争论经常会吸引政府组织、医学专家、科普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网民的积极参与，产生观点态度和立场的交锋，不同利益归属与不同价值观念的群体在多种媒介展开对“中医”问题的话语竞争与博弈（曹昂，2016）。纵观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医存废”之辩，实则是传统中医所表征的中国“玄学”知识体系，与西医所表征的西方启蒙以来的“科学”知识体系间此消彼长的张力。若将“中西医之争”简单地放置于新媒体语境下分析，不仅无法看到争论的源头与流变，也难以探究其本质，更遑论深入廓清“中西医之争”背后更为深远社会医疗观念的媒介建构，及其表征的近现代以来的“科学-玄学”之争。

科玄之争的核心实则是西方现代性与东方文明系统之间的冲突。西方现代性自文艺复兴萌芽，至启蒙运动发端，以理性和科学主义精神为主导，通过恢复人的主体性，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构合法性基础，这是现代性概念的基本内

---

<sup>1</sup> 作者简介：王楠，中国社科院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变迁、传播思想史等，对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材料搜集和文章写作；徐婧，传播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思想史等，对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研究指导、修改和写作。

核（刘同舫，2015）。在此基础上，现代性囊括了对理性的信仰、对传统的怀疑、对自由平等的坚持、对进步的许诺等（李思逸，2018:1），被更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同体现出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特征（陶立夏，2022）。因此，当近代中国陷入东西方冲突之时，“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成为应对和解决冲突的重要取向。在此基础上，洋务运动以技术现代性为主的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现代性为主的启蒙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衣俊卿，2004）。然而，长久以来西方现代性知识理论和中国历史经验之间似乎有一道难以言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对立被表述为中国历史特性与西方普遍现代性，或称“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矛盾（李思逸，2018:13）。但实际上，现代性也是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项对批判的先进尝试，反思性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核心（李思逸，2018:9）。言说和实践现代性的过程，也是再一次确证“自我”的过程，其特征并非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确证（安东尼·吉登斯，2011）。因此，透过回溯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态交汇初期，现代性如何被言说、传播，及其引发的争论、反思与重构，是锚定中国现代化逻辑起点的重要一环。

因此，本文尝试以小历史事件为“原点”，即以1929年“废止中医案”为中心，考察作为当时新媒介物的报与刊，建构和传播了怎样的中西医知识，发掘其中媒介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科学和现代性知识、观念的建构机制，以此透视这一整套机制所表征的近代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科学-玄学张力。

## 一、“中西医之争”的媒介话语及其医学知识建构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世界以科学性和现代性自成体系，势不可挡。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医”由此成为了一个中国社会文化与思想落后、封建并与现代科学相对立的象征符号。因而，当“科学”一词成为评判事物合理与否的标准，科学话语便成为一种社会共识（common knowledge）和中西医文化对话的基础，中医界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处境（邓文初，2003）。正如梁漱溟（2006:33-39）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谈到的，在西方科学与现代性话语的冲击下，不能自我表述的“中医”实际上也表征着整体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失语，其背后是一种中国文化不能自明的危机和困窘。

随着中西医争论的发展与传播，本属于学术界的核心议题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成为影响整个近代社会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的重要因素。其中有研究指出，在关注西方医学知识与观念体系对于中国科学启蒙或称社会革命的同时，更要看到对这一知识观念体系进行传播、记载了整个社会变革历程的媒介及媒介话语（陈佳丽，2018:199）。正如如黄旦（2019）所言，近代传教士以“书”办刊，

或以“刊”办书，或以“刊”代书，奠定了中国人对新媒介——报与刊的基本理解，从而侵入到本由中国书籍独占的知识生产领地，让“为往圣继绝学”（冯友兰，2013: 42）的传统知识追求逐渐动摇，“新闻”“新知”成为社会公众求索世界、拯救国运的新通道。在此意义上，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改造传统符号话语体系，乃至文化文明体系提供了最为有效的传播和言说空间。因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媒介使得分属“中西医”学理性的医学及卫生知识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公众的社会实践相联系，不断重塑着“中医”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认知，也不断重塑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观念与知识网络。通过媒介及媒介话语对于知识与观念的传播，“经验得到叙述、分享、修正和保存”（黄旦，2019）。尤其是五四时期白话文在包括专业性期刊与报纸在内的传播媒介中的兴起与应用（王慧，2016），促使“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实践，及其背后所表征的玄学-科学之辩也逐渐达到白热化。

更具体地，依托于近代报与刊媒介载体的话语呈现、建构和传播，中国医学知识体系及其所表征和透射的社会思想发生转变。中医与西医借助不同的话语策略，在话语博弈之中实现自身合法性的建构。

### 1. 西医出场：医学话语的重塑与科学合法性的建构

明末清初，西方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附着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进入中国社会视野。其中，西医作为西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借助西医理论、西医诊疗实践和西医相关的文字、视觉系统，成为挑战传统中医体系、塑造新的身体观、信仰体系的重要系统。但在此时，中华文明尚未在与中世纪欧洲文明正面交锋，在“天朝上国”的整体对外观念影响下，西医体系的诸多挑战，并未真正撼动传统中医的循证体系、身体观念与卫生知识的地位。到了晚清，“医务传教”成为基督教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西方传教士借助创办医院，开启了新一轮的西医知识普及与身体治疗实践。如何建立西医及其话语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仍旧面临巨大挑战（刘涛，2018）。

西医是如何建立话语优势，让其在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认知语境下完成“出场”、存在的合法性？

首先，西医通过凸显与挪用中医难以解决的两大疾病难题——眼疾和肿瘤的视觉符号，以识别和挑战传统中医的弱势。在赋予事物强大的释义规则并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优势的同时，呈现出中医的“话语局限”（discursive limits），从而构造出中西医的冲突性认知语境（同上引）。其次，西医通过宣传与传播自身“科学性”与“现代性”的学理标准与话语体系，建立起超越个体，进而关涉国家与社会公共卫生体系的更具普世性的话语意义。在“西学救国”、“卫生救国”的晚清以降，西方医学与卫生知识开始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发生勾连。通过现代报刊

的知识与观念传播，西方卫生成为现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而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医学健康观念却成为了封建、野蛮与落后的象征（陈佳丽，2018:216）。因此，在这种西医科学话语的笼罩下，中医的“话语局限”与西医的话语优势都愈加明显。

在知识转型与“现代国家形塑”的大背景下，“医疗”的意义逐渐脱离“个体健康”范畴，转而与现代国家卫生体系的建设布局相勾连，成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表征系统（李耘耕，2019）。科学成为中国实现知识观念转型、建立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基础，是型塑现代国家、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真理”之所在。与之相伴的，“科学化”一词既作为动词成为社会改造的一种手段，也作为名词成为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由此，“现代医学”、“科学医学”、“医学科学化”的口号与话语在此时成为主流（李彦昌，2020）。另一方面，作为“言说现代性”的一种路径，科学观念通过话语建构和媒介传播，使得现代性想象具体地参与到中国的社会运作过程之中（李思逸，2018:1-3）。

## 2. 中医转向：中医“失语”与“民族主义”的话语勾连

中西医本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拥有各自不同的医疗思维理念、话语系统、乃至生命宇宙观念（梁漱溟，2018）。具体来说，中医的基本思维是整体论，强调的是一种同源异构思维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即身体各部分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依存。而西医的主体倾向于原子论，病理观念是现代科学思维，强调对病症之“因”的探索（刘涛，2018）。如上文所言，民国以来，“科学”逐渐建立起其合法性，科学话语成为一种话语共识。针对西医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其“科学性”的质疑，中医试图挪用科学性的概念与话语来再度阐释自身存在正当性，却显牵强。因此，中医开始转向“民族主义”的话语策略（李晓涛，2012）。

在西医“科学”话语下，中医及其所依托的传统玄学系统受到全面的质疑和挑战。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成为近现代中国应对内患外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医旋即与“民族主义”合流，将中医话语与民族主义勾连起来，作为抵御和驳斥西医及其话语的突破口。中医与三民主义政治纲领、中国国粹文化与抵御外侮的民族情感相联系，从民族性、民族繁衍、抵制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等方面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张爱华、岳少华，2010），使得在极具冲击力的西医面前，长久胶着，相互制衡。

中医借助“民族主义”保存了其合法性，但中医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存续的问题。民族主义也并非平静的“避风港”：以“废止中医案”为中心，废止中医和存续中医似乎都与中华民族的生灭勾连起来。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西方列强的侵略相伴而来的是“东亚病夫”这一话语的生产与传播。由此，身体、疾病与医疗体制的隐喻被不断复杂化：东方“天然”的孱弱与

旧有医疗话语、体制及其玄学的认识论系统勾连，让中医的革新派看到，“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他们在国内创造性地推行现代医疗与卫生体系、促进中医科学现代化的话语助力（李耘耕，2019）。最终，“国医科学化”成为了中西医界的主流话语，也成为了中医借科学之“术”解其“困”的自我革新的方法（李秉奎，2017）。

## 二、研究方法

1879年俞樾撰写《俞楼杂纂》（共50卷），全面论述和张扬自己废除中医的观点。1929年2月，曾在日本留学的余云岫与褚民谊等人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包括中医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其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禁止成立学校等内容，获得了当时卫生委员会的认可和通过。提案公布后，遭到中医界的强烈抗议，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议，最终迫使民国政府取缔了余云岫等人的议案，史称“废止中医案”事件。“废除中医”的提案虽并未通过，但是自此之后，中医存废与中西医之争成为长期的舆论焦点。报章与期刊作为近现代社会事件舆论交锋的主要阵地，为考察“废止中医案”这一微观历史事件的公共讨论、还原围绕此事件绵延开来的中-西医“新知”生产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语料。因此，研究试图透过上述历史回溯，揭示这一历史事件蕴含的介质-机制-文化形式（李仁渊，2013: 13）三重关系，立意是谓“管中窥豹”、以小见大。

源于本研究主要关注作为民国时期新媒介物的报与刊，因此，研究首先基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检索相关期刊对“废止中医”事件的讨论。因“中医”在民国时期又被称为“国医”、“旧医”，因此研究者分别以“废止中医”、“废止国医”、“废止旧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35篇相关文本。其中，涉及到的期刊类型为如《医界春秋》《中华医学杂志》《杏林》这类医学社会学刊物，相关的文本讨论所涉时间由1929年持续到1948年，也足见此事影响之深远。之后，研究者通过逐篇阅读，剔除样本中的通知和告谕性质的训令<sup>1</sup>、部令、政府令、代电<sup>2</sup>、公函<sup>3</sup>；以及同一文章发表在不同刊物的重复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71篇。接下来，研究选择在中国报刊史地位显著的《申报》为典型报纸，以爱如生“申报数据库”为《申报》文本史料来源的数据库，同样以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由于报纸相比于期刊的报道周期短，时新性强，相关的报道数量众多，因此对于报纸相关文本的选择，本研究以1929年为时间节点，筛选这一年内的报道内容。最终收集到共收集到包括启事、通告、文电、社论、广告等报道109

<sup>1</sup> 训令指上级机关对所属机关带有命令性的指示，是公文的一种。

<sup>2</sup> 代电指旧时一种文字简单的公文，像电报，经邮局作快信邮寄。

<sup>3</sup> 公函指正式的或官方的书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间商洽和联系工作时使用的一种文体。

篇，在逐篇阅读并剔除重复性样本后获得 72 篇有效样本。

研究对上述总共获得的 143 篇原始研究材料进行编码和文本细读，应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2003）提出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将史料中散落的符号、文本碎片串联起来，以勾勒媒介中呈现的中西医之争的话语实践，并对话语实践背后更深层次的话语机制进行剖析。最终，研究希望借助上述论证，阐明历史小事件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现代性进程间的勾连，即科玄之争如何成为科学主义等西方思想观念进入中国的契机，并探析其如何作为理性和理性主义等启蒙思想的基层依托，进而成为现代性的表征与工具（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

### 三、科玄之争的表征系统：“废止中医”的传播及其公共讨论

回到以“废止中医”事件为代表的历史现场，即回到具体的媒介话语建构与传播情境，是探求媒介-机制-历史文化形式三重勾连的第一步，也是通达本文所重点关注的以科学-玄学之争为表征系统的传统性-现代性之争的基础。对于“废止中医”一案，中西医界、持有不同立场的社会公众在各大报刊中口诛笔伐，针对中西医所表征的科学与玄学、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以争夺话语空间。正如很多报刊在评论此次中西医之争时，都用到：“短兵相接”或“势若冰炭，短刃相接”此类战争话语，足以窥见论争之激烈。

纵观“废止中医”的论争主体，提案的拥护者主要包括余云岫、褚民谊、汪企张等人，作为西医界代表，其多具有西学背景，早年留学日本或英国法国等地，因而，其医学主张中渗透了西方科学理性较为激进的思想（郝先中，2005: 137）。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张伯熙等老一代中医与陈存仁、张赞臣、陆渊雷等青年一代中医作为中医界代表，其或出生于中医世家，或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长期浸润于中国传统医学理念（刘海明，2011: 21）。但事实上，中西医界双方的论争并非界限清晰、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出变动与融合的形态，即西医派并非自始至终全然固守彻底废除中医的思想，而是也在论争中结合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医存废问题进行反思；中医派也并非全然固守传统中医理念，而是也在论争中结合科学、理性的现代性思想反思自身的发展与存续方式。同时，因医药关系民族、民生，此次事件自然由医界上升到整体社会层面：不仅引起中医界的高度聚焦与抗议，同时也引发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医存废问题的热烈讨论。

总体上，报刊中所呈现的关于“废止中医”事件的舆论，对照中央卫生委员会原有提案的“科学性”与“现代性”的单向问题，呈现出一种“复调性”（polyphony）：即不同出版物的文本中、多元的传播主体针对同一话题发声时，呈现的对话性与互构性（王永祥、潘新宁，2012）。这其中不乏不同主体针对同

一篇评论文章作出的多篇回应,诸多观点或认可支持,或觉其荒谬,或批判质疑;其回应语气或慷慨激昂,或平静理性,或谦虚商讨,缺如复调合唱一般。

通过对所筛文本的细读,民国医学出版物关于“废止中医案”的舆论中大致存在以下四种话语策略:1.以其背离现代性、科学主义为由,支持彻底废除中医;2.质疑西方科学主义合理性、合法性,不支持/拒绝废除中医;3.不支持彻底废除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遵循西方科学体系进行改进,否则会被自然淘汰;4.不支持彻底废除中医,也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改进中医体系,但其强调本土文化与科学的相协调性与相适应性。

### 1. 彻底废止中医

在第一种话语策略中,中医基于玄学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其与西医的科学认识论的转型同构。因此“不能允许它存在于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林启钦,1929),必须废除中医才能符合现代医学的发展路径和基本认知体系。有文言及:

中医所倚赖的是经验,而西医所需要的却是实验。前者只能应付表面的事件,而后者却能复制病象,从根本上加以探究;……从学术的本身讲:中医的不科学和西医恰恰相反,科学是有系统的学问,是绝对尊重论理的,不是马马虎虎的东西。(同上引)

在剖析了中医与西医的重要区别后,该作者又从“新陈代谢”定律、矛盾的定律与时代的淘汰性规律进一步解释“我们的世界是进步的,旧的应该换了新的,正如人的细胞更替一般”(同上引)。另有评论将中医等同于玄医,以医疗体系的发展隐喻国防兵器的进化,指出:

闭关时代,国防将勇,手执大朴刀或长矛,也足以防御贼寇保卫地方,今若要与外国打仗,毕竟不能不用科学式的新军以及器械,玄医就好比手执大朴刀的将勇,因一切普通原因而起的好比内地贼寇,微生物好比外国兵,命将勇去抵挡外国兵,必败无疑。中医盖因落后,好比面临西方枪炮之师而我国人则手持寸铁几乎无抵挡之力,中医之寸铁并无力解决疾病之根本。(佚名,1930)

在这段论述中,还隐含了一个更重要的隐喻:普通病因而起之病为“内地贼寇”,这时的所谓疾病,是中医玄学体系下的“病”,是本土的、经验中的;而“微生物”这一在现代科学生物学视角下才得以生产的新概念、新名词,与“外国兵”勾连起来,此种比喻也直接点明了在中西医之争中,最为核心的实则是落后陈旧的东方与先进的西方之间的比较与博弈。因此,中医存废不仅是医学进步之关键,其也暗指能否彻底以“外国兵”所使用的整套西方“枪炮”武装自身,



以此才能与“外国兵”一决上下。

## 2. 拒绝废止中医

在第二种话语策略中，不支持或拒绝废除中医的中医人士与社会公众，通过将中医与“民族性”相勾连，质疑和挑战西方科学主义合理性、合法性。

首先他们质问：“科学”是什么？中医是否真的不符合科学逻辑，或全然没有所谓科学的成分？以科学的标准衡量中医是否如同“削足适履”？上述质疑的核心在于：挑战了西医所立足的西方科学认识论，肯定中医认识论、理论体系与文化源流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具体而言，对于“废止中医”的行为，此种话语策略以“丢国粹”“摧残国学国产”“卖国媚外”“依附帝国主义”“反三民主义”“亡国灭种之政策”，因此“提倡中医就是救国主义”“中医中药，国脉所关，民命所系”（《申报》，1929年3月18日）等民族主义话语来反击（见图1大字部分）。笔者发现，上述依靠“民族主义”话语，尝试跳出以“科学性”话语逻辑为对照的窠臼的质疑性话语策略，蕴含着一种挣脱“站在西方看东方”的启蒙逻辑的反身性。有文章论道：

夫六合之内包罗万有，科学其能解决一切乎。既不能解决一切，又不容其他学说存在。科学理有未穷，知有不尽，科学有不彻底，不得不假道于哲学，以求尽其所知，而贡其所事也。（梁长荣，1934）

其内容未将“科学”局限于当时西方医学理念的框架，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动态与发展的概念，旨在说明科学并非万能，其所蕴含的道理与知识也并非穷尽世间所有现象。其他相似的评论，也论证道：“所谓科学者，分科学习之谓也，既有完备之理论，又有正确之效果也”，中医“明效可验”且“中医理大深奥，非文字言语所能诠释”，因此“反谓其不科学而欲废之”（恢元居士，1929）显然并不恰当。因此第二种话语策略，虽在强势的西医与西方现代性面前有所踟蹰，但依旧坚持了中医及其玄学内核的合法性。



上去，提高国际地位，才能适于生存，中国现在国际地位的低落，原因虽多，但是术生幼稚，医学陈腐，也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所以除竭力提倡术生建设外，尤主张中医之改良……老是这样子的故步自封，不要说几千年了，只怕不到几百年，中医必定要消滅的；不要说有人主张废除了，便是无人提议废止，只怕自然而然就要消滅的。（褚民谊，1929）

在此种话语策略中，科学主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正确的世界观，中医的改革之道除了“科学化”与“现代化”别无他途：“如不能改弦易辙而为科学化，就难逃废止的法网”（陈独鹤，1929）和优胜劣汰之自然定律。第三种话语策略认同中医传统，却认为其以“虚理”为主，在科学面前难免软弱无力，终成中国落后一大根源。

#### 4. 中医西改的“中国化”路径

第四种话语策略是第二种话语策略与第三种话语策略的中和，既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改进与重塑中医，又强调应反思科学之法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适应性问题。在第四种话语策略中，科学并非绝对真理，中医也并非全然无科学之成分：其虽亟需反思与改革，但并非如第三种话语策略中强调的那般——科学化是中医改革的唯一路径。如有言论谈到：“惟所谓科学的与非科学的，亦不过是比较的，西医之科学真确，并非绝对是的，中医之非科学，亦非绝对的不是”（韩安，1930）（可参考图2对于一味信仰西医的讽刺）。针对如何改进中医，有言论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在其中的关键：“‘改进’这二字的确是中医不发达的症结，但是如何改进又难说了，因为习俗的关系”（汪企张，1929）。

具有西学背景的黄季陆进一步论述道：

照医学的进化上看，大约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是神怪时代，如野蛮社会以祈祷鬼神治病之类；第二是玄学时代，如阴阳五行等，不可捉摸的医学道理等；第三是科学时代。照现在中西药的情形来讲，中医是在玄学时代，或在玄学与科学时代之间。进步的西医则已入于科学时代。所谓中医，尚在玄学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医理中没有科学的成分，不过尚未经过科学的整理而证明其为科学的而已。所谓西医已入于科学时代，并不是说凡冠以西医西药之名的东西皆是科学……两者的差异虽有，但在治病的效能上，实在很难断定其优劣，因为只要是正确的经验，他的效用和科学的处方是有同样价值的。（黄季陆，1930）

可见此类观点认为，中医并非完全与西医的“科学性”与“现代性”相对立，只是发展的节奏与轨迹不同，中医的效验虽未经整理，但并不代表没有科学的成分与价值。



图 2：《医届春秋》一文插图

纵观第二种与第四种话语策略中话语主体对于“科学性”评判标准与“科学性”改革路径的质疑，笔者发现其中都不免存在一种话语游移与矛盾的张力。具体而言，同一语篇中存在面对“科学”时相矛盾的话语：一方面质疑中医，称人体的奥秘“究非今日之科学所能详悉”，具体改进的实际操作也亦非“科学”二字所能涵盖；另一方面，却又不知以何种方式、参考何种模板进行改进，最终还是回归“科学”的话语来证明中医存续及其可改进的合法性——正是“中国的现代性以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而展开”（李思逸，2018:18）的缩影。正如黄季陆所言，虽然中医与西医以及与“科学”并非对立，但以神怪到玄学再到科学时代的发展顺序进行区分也隐含着“进入科学时代”是中医接下来的必经之路，无论中医其自身再有个性化的内涵与普遍化的效用价值，最终还是要向“进步的西医”看齐“渐入科学轨道”。

#### 四、言说中国现代性：从“中西医之争”、“科玄之辩”到现代性

上述围绕“废止中医”事件的话语策略不仅勾勒了科玄之争的复调舆论及其表征系统，还隐含了媒介与话语、观念传播的勾连，由此，报刊成为“中西医之争”与“科玄之辩”的关键场域及言说方式。接下来，探究这种论争如何借由科玄之辩为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和言说打开空间，并剖析其中的话语机制与传统-现代相互辩证的社会关系、文化形式之间的深层联结成为关键。

##### 1. 树立“他者”以想象现代性

当中医难以融入或挪用“科学性”与“现代性”话语，并用其解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时，各界舆论主体除了使用上述话语策略中的“民族主义”话语、质疑“科学”标准的话语、主张改良话语来挑战传统的“自我”以外，还生产了新的媒介话语策略转向——以中医在作为“他者”现代性国家收获的认可作为重新确立、形塑自我的依据。多篇文章以中医的效验价值在他国得以验证、获得赞誉作为话语策略，以此来反击“废止中医”、“中医无用”、“中医不合科学”等言论，并以此重新确立自己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上述话语逻辑在报刊媒介实践中有一些具体的体现，诸如：“中医中药，全球赞美”（李如冈，1934）、中国医药“今日为世界所通用”（张伯熙，1929）、“中药之效力已引起全世界之研究”（陆渊雷，1929）的全球性佐证。如日本因同属东亚，虽其以“西学”维新而成功步入世界现代性轨道，获得国际地位，但其以“汉医”（即“中医”）为代表的医疗体系，实则与中国医疗体系乃至玄学体系同根同源。因此，“汉医”的存续也为中医和中国玄学体系的存续提供参照。

有刊物不断刊文论述：

据各报近年所载，东西各国近已渐信中医中药，实出西医西药之上，而日本信之尤盛，是中医中药之价值，将来在世界上必居中药地位，已可预知。（恢元居士，1929）

日本且设立东洋医道会，皇汉医界社，大张旗鼓”、“据朝鲜总领事处春芳报告，我国药材，每年输入日本约值六百万元，其种类计二百种，由东京帝国大学研究调查，确认为有治疗的效果及有效的成绩，故渐次试用，日益增多。（欧阳秉钧，1933）

除了以日本作为参考，作为“中医”质疑源头的“西医”，及其背后的文明、制度认可也成为“中医”得到认同的关键。如“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与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申报》，1929年3月21日）“近时除日本复兴东洋医道会之外，美国亦甚欢迎中医中体，频宣证于报纸”（《申报》，1929年5月23日）。与此同时，海外华侨对于“中医”的认可及由这一群体所观察的侨居国人对于“中医”的态度，也成为中医界言说自我的重要参考。有刊物引用一位华侨的论述：

中医药甚至远出南洋欧美的华侨，身寄异邦，对于中医中药，信仰亦不稍衰，故足迹所至，医药随之，彼邦政府，亦不取缔，驯至该地人民，亦生信仰；侨外同胞的健康，赖以维持。（子蕢，1929）。

此时，“西方”、“他国”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种时间与意义的参考（刘文楠，2013），中医通过与这种参考的比对来建立自己的“身份”、确立合法性，进而重塑自己的社会形象与地位。这种话语策略显示出“中医”话语在强势的科学话语反复冲击下，为重建话语体系“求助于”与自我对立的“他者”（the others）/“他国”（王申、马钊，2015），以此确认自我主体的身份与地位。这种话语建构，表层是以强大的“他者”的肯定来证明自己，而深层则是以西方所规定的东方看东方。我们称其为“中医”/东方的“东方化”和自我异化：东方与西方从地理空间概念、话语观念体系到社会发展序列

的区别，在“中医”的言说和被言说中逐渐明晰，而这种以“西医”和西方为圭绳的话语实践，即就是一种认同且内化的东西方区隔体系。

实际上，正如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积极走进西方所代表的世界、不断突破自身“解释系统”以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实践，一方面体现出以“科学”、“现代”与“世界”标识的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的内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梁漱溟所言的在西方浸润下东方的异化（罗志田，2018）。但同时，通过对媒介呈现中话语实践的溯源，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话语转向中内部充满张力的矛盾性，即在“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想要跳出“西医”科学话语体系的质疑，但同时其在构建自身话语体系合法性、寻求“他者”认同性的过程中，依然走入并继承了“世界”的科学话语体系，因而其不免陷入自我“东方化”的困境。如李思逸所言，言说现代性即就是通达现代性之路（李思逸，2018:13）。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围绕“废止中医案”展开的媒介及传播实践中，所用话语策略背后的话语体制及其社会图景，以此来探索介质-机构-文化形式间的关联逻辑。

## 2. 否认玄学及其文化形式以言说现代性

考察话语体制及其后的社会形构，进而解析话语的建构、传播与当时历史思潮及现代性问题的互嵌、互构，是透视小历史背后大图景的必经之路。在“废止中医案”中，中西医冲突被报刊这一媒介塑造为一种中西医背后各方政治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反对废止中医药的话语主体认为，中医药界“向来不去干预政治”“国家一切的大小事务，都充耳不闻，不去干预”，但却被少数西医“滥用政治手腕来胁迫中医”，给了“西医大人们”以政治权力左右国家与中央政策的机会，因此“彼既借政治势力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佚名，1929）。的确，废止中医派的西学代表多参与中央卫生部门行政工作，积极参与中央卫生会议，并形成上海医师公会的组织力量，从而对中医体系进行打压（郝先中，2005:137）。

中医界代表吴汉仙将中西医视作不同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指出：

治病犹之治国，中医注重内政，西医注重外交；西医手术器械，固犹飞机大炮也，然以治外交则可，若以治内政，适见其入室操戈自相残杀而已，其何以久安长治乎。（吴汉仙，1933）

另一方面，“废止中医”、推崇科学新医这一医疗话题，成为国家政治问题之表征：勾连如帝国主义侵略、不平等条约、东亚病夫等休戚家国命运的近代政治话语及其意义生产。此时，推崇西医甚至被称为“卖国阴谋之危险行为”（欧阳秉钧，1933）。

除报刊直接以文字、话语表述、表达政治、权力等相关内容之外，各语篇中

所包含的中西医空间理念差异的描述实际上也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比如，围绕着废止中医案的舆论争议中，“中医”为何被归为“旧医”，甚至会被推向“废止”的政治决议？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时报刊内容生产的重要主体，也最能体现话语体制的内涵。

“因秘失传”、缺乏学科之系统性是中医被归为“玄学”的关键症结所在，正如有中医界人士反思言及：“中医的内部，向来是很复杂的。歧分门户，各成一见之偏。人自为家，滥泛殊无统系”（刘鸿钧，1930），且“中医素乏团结精神，对医学无集体研究，靠自己摸索，任其自然发展，所以进步极难；而吾国政府，对中医很少关心和扶植，前此无法律保障，良方秘药，缺乏奖励，致有一技之长者，即秘为存生之饭碗，不肯公于社会，因而失传者，不可胜记”（何南群，1948）。由此，比起中医的“因密失传”，西医因可见、可测量、可验证的知识体系<sup>1</sup>且具标准的诊疗方案、处方而渐兴盛，得以流传。于是，无论是秉持中医应坚定不移地进行科学改革者，或是对“科学”的方法虽有摇摆，但仍强调中医需反思的改进者，均不约而同地建议中医“虽改进之道多端，而打破秘传，尤为重要，现世固不乏良方，徒以不能共知共晓、共通研究、共同改良”（颐和，1929），所以“应设法使一切秘密处方公开，俾成为医学上共有之物，以贡献于社会，此关系中医之信用极大，大家再不可自私了”。此时，中医若想存续，则需改革其“秘传”之传统，而此种传统恰是中医的“玄学”根基所在。

中医之所以“秘传”，而非西医式的标准化、可习得的科学知识体系，在梁漱溟看来，盖中医西医之异同在于，西医以身体为对象，而中医则以生命为对象。更详细来说，中医之根本源于道家，其中“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无能关与所关，如此方是真的玄学，玄学才到家。”（梁漱溟，2010：13-33）以此来看，中医也好，玄学也罢，其习得、传承，或是内观、外观靠得是“体悟”而非学习。梁漱溟随后对西医立足的科学也做出评价：“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于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梁漱溟，2010：13-33）因此，中医无法存续或亟需改革之处，即是玄学之根基，也是科学所无法抵达的动态的、整体的、与宇宙同息的生命关照。

正如上文所述，中医所立足的玄学，在生命关照和传承空间两个角度是“动态”的与隐秘的，这是中医无法通过“数学化”，即科学化改造而向西医靠近的

---

<sup>1</sup> 这里需要说明，比较其中医所立足的宇宙观，西医是可见的。这不仅仅是西医科技层面的领先，而是中医气、经络、大小周天的“虚拟”和需感知；而西医则是通过完全、直接可见的视觉系统来表述自我的。

原因。中西医之争的媒介实践，恰恰也在不断地阐明这一观点：中西医之争的解决方案并非是由中医兼并西医，而必须是由西医理解包容中医。或更进一步，中医惟有彻底与玄学的整体生命观做出决裂，将其整改为可见、可计量、可数学化的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与西医及其所表征的科学体系相抗衡。而这一逻辑依然是“东方主义”的具体显现。

## 五、余论

1929年“废止中医案”和围绕其展开的媒介实践，将中西医从思想到行动的交锋推向了前台，“中医”成为了整体“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最终由中医存废之争而引发的对于科玄问题、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似乎变成了中国社会各界应对近代危机的一个突破口。实际上，正如杨念群所说，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看作“现代中国”完成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杨念群，2013: 158）。

以“废止中医案”为中心的报刊呈现，在嘈杂反复的话语建构中指向一个共同的“启蒙”母题，即现代性启蒙——以科学的、理性的、数量化的现代性体系取代古典的、混沌的“蒙昧”。中西医之争的媒介话语，及其体现的科玄之辩，实则是对如何开展、如何言说中国现代性的纠结体现。“废止中医”的媒介生产及其传播，是谓现代性的一种症候。透过对玄学的贬抑，科学与玄学之辩中玄学终落下风。最终，中西医之争的逻辑完全嵌入西方的科学逻辑——师夷长技的结果不是制“夷”，可能是成为西方逻辑下的“新东方”。

当我们再审视媒介-机构-文化形式间的勾连时，科学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伴随着论争的白热化，被报刊广为传播。而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就寄寓在其话语及意义结构之中。中西医的话语之争，实则是科玄思想之辩，而想象现代性、言说现代性的进路则蕴含其中。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载体，其综合了“报”与“书”的媒介特点与文化偏向，改变了以往书籍对于权威医学与健康卫生知识的方式——以训诂为主的对典籍的阐释，转向以求新为主的对新闻/信息的传递。而其本身集合新的信息知识组织形式，参与新的文化形式建构之中，可谓中国近代现代性言说和制造现代性想象的重要场域之一。

本研究认为中医界以及社会其他各界对于“科学”标准质疑与反思、对于本土文化如何与“科学”系统相适应的话语，以及中医积极寻求其他话语方式寻求突破的努力，虽有一种矛盾与游移的无力感，但却闪烁着对于“科学”“现代性”与“自我”的启蒙之光。正如梁漱溟通过中西医所折射出的东西方迥异的生命观、世界观及宇宙观来论述这一历史节点中的中医变革一般，其意义已远超医学范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存在于东西之间、科玄之间、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从未间断的



博弈历史中，应被言说的吉光片羽。而在当下锻造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时代语境下，重思“现代性”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旅行”，是勾勒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安东尼·吉登斯(2011)。《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曹昂(2016)。“诊脉验孕”挑战赛的传统媒体框架建构——基于报纸新闻的“解释包”分析。《科普研究》，(05)，23-28+97-98。
- 陈独鹤(1929)。社会舆论：废止中医的商榷。《医界春秋》第34卷。
- 陈佳丽(2018)。《传播与流变：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 陈瑛(2003)。“东方主义”与“西方”话语权力——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反思。《求是学刊》，(04)，29-33。
- 程萧潇,金兼斌,张荣显,赵莹(2020)。抗疫背景下中医媒介形象之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61-70。
- 邓文初(2003)。“失语”的中医——民国时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开放时代》，(06)，113-120.1。
- 冯友兰(2013)。《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韩安(1930)。言论：中国医药不可废止之管见。《上海医报》第17卷。
- 郝先中(2005)。《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何南群(1948)。中医地位低落，原因何在？。《医学新声》第7卷。
- 黄旦(2012)。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再谈报纸的“迷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96-100。
- 黄旦(2019)。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01)，137-158+207。
- 黄季陆(1930)。主持正义：关于废止中医的一点相反意见。《医药学报》第4期。
- 恢元居士(1929)。废除中国医药之公评。《大同学报》第1卷。
- 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姜永琳,普利娅·查柯,张旭鹏,西亚瓦什·萨法里 & 谢晓啸(2019)。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史学理论研究》，(02)，4-30。
- 李秉奎(2017)。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历史研究》，(02)，57-72+191。
- 李耘耕(2019)。传播“健康”：民族主义、科学现代性与近代中国“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一项基于《中华健康杂志》(1939-1949)的考察。《新闻大学》，(02)，43-63+119。
- 李仁渊(2013)。《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新北，稻乡出版社。
- 李如冈(1934)。读“废止中医案抗争之经过”的回忆四古诗。《医界春秋》第94卷。
- 李思逸(2018)。《铁路与中国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文化想象》。香

- 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晓涛(2012)。以“民族主义”阐释中医药——民国中医界的话语选择(1912—1937)。《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168-173。
- 李彦昌(2020)。共识与分歧: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由来与多元实践。《人文杂志》，(04)，58-68。
- 梁长荣(1934)。评论：科学非万能。《国医旬刊》第1期。
- 梁漱溟(200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梁漱溟(2010)。《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
- 梁漱溟(2018)。《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启钦(1929)。读者的园地：中医废除问题。《社会评论》第2期。
- 刘海明(2011)。《“废止中医案”与上海中医界的图存抗争》。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鸿钧(1930)。我读了“废止中医案抗争之经过”以后的感想。《医界春秋》第46卷。
- 刘鸿钧(1930)。“从“废止中医”联想到“中医考试”。《医界春秋》第50卷。
- 刘佩英，刘旭(2019)。改革开放40年图书出版与思想史的逻辑进展——以哲学图书为例。《中国出版》，(08)，25-28。
- 刘涛(2018)。图绘“西医的观念”：晚清系移动键的视觉修辞时间——兼论观念史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1)。
- 刘同舫(2015)。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4-23+202。
- 刘文楠(2013)。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05)，89-102+159-160。
- 陆渊雷(1929)。纪载:本院为中央卫生会议废止旧医案宣言。《上海国医学院院刊》第1卷。
- 罗志田(2018)。文化表述的意义与解释系统的转换——梁漱溟对东方失语的认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89-102。
- 米歇尔·福柯(2003)。《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诺曼·费尔克拉夫(2003)。《话语与社会变迁》。北京：华夏出版社。
- 欧阳秉钧(1933)。对于日本奖励栽培汉医药与汪精卫氏废除中国医药之感言。《现代医药月刊》，第5期。
- 彭卫华，贺霆(2019)。现代医学研究语境转向与中医人类学学科构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17-24。
- 苏珊·桑塔格(2014)。《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宋永林(2020)。晚清中医期刊的出版概况、特点及其影响。《编辑之友》,(11), 106-112.
- 陶立霞(2022)。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的中国现代性文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10), 5-17+140。
- 汪企张(1929)。社评:与严独鹤先生论废止中医书。《医药评论》,第6卷。
- 王慧(2016)。论胡适启蒙救国思想及其媒介建构。《学术界》,(05), 186-195。
- 王申, 马钊(2015)。“海客谈瀛洲: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想象(1839~1978)”工作坊综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04), 84-88。
- 王永祥 & 潘新宁(2012)。对话性: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当代修辞学》,(03), 40-46。
- 杨念群(201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颐和(1929)。社会舆论:谈谈废止中医。《医界春秋》,第34卷。
- 佚名(1929)。保存国医之呼吁。《兴华》,第10期。
- 佚名(1929)。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申报》,3月18日。
- 佚名(1929)。全国医药代表昨晚晋京请愿。《申报》,3月21日。
- 佚名(1929)。薛部长关于中医药之谈话。《申报》,3月22日。
- 佚名(1929)。国际无线要电:中国医药界之荣誉。《申报》,5月23日。
- 佚名(1929)。褚民谊演说希望中西医合作。《申报》,9月23日。
- 佚名(1930)。论说:我们为什么主张废止玄医(中医)。《广济医刊》,第9期。
- 衣俊卿(2004)。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4), 13-24+205。
- 於红梅, 潘忠党(2018)。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08), 5-24+126。
- 余新忠, 陈思言(2017)。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3), 111-128。
- 张爱华, 岳少华(2010)。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139-144。
- 张伯熙(1929)。卫生会议主张废止中医药之感想:异哉各国医药界反研究若狂。《医界春秋》,第34卷。
- 张洪彬(2019)。晚清疾疫理解的更新与世界的祛魅。《学术月刊》,(10), 172-184。
- 褚民谊(1929)。卫生会议无废止中医决案,惟主张改进求其能科学化。《广东医药月报》,第4期。
- 子蕢(1929)。我们反对废止中医药之真义和革新中医药的主张。《广东医药月报》,第3期。

左玉河(2004)。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05)，77-90。